

“四大寇”与清季革命之缘起

李金强
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

孙中山倡导革命于香港，期间在港与尤列、陈少白、杨鹤龄三人结成好友，时常聚谈，对于中国时局，日渐不满而形于言行，四人均表现仰慕洪秀全，以成王败寇而自况为“四大寇”。¹“四大寇”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“倡导者”或“先行者”，故每每见之于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史著述中之倡导时期。至于“四大寇”日后事迹之记述，除孙中山外，尤、陈、杨三人所占篇幅甚少。故本文即以“四大寇”的生平及其事功作为论述对象，藉此了解孙中山及其早期革命伙伴，于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上所扮演的角色。

一 “四大寇”的自述及撰著

“四大寇”一称，孙中山于其回忆革命缘起，早已言之，始见于与宫崎寅藏之交谈。谓其于香港西医书院就读时认识尤列、陈少白及杨鹤龄三位革命同志，²稍后于其所著《有志竟成》，再次提及“四人相依甚密，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，数年如一日，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，皆呼予等为‘四大寇’”。³聚谈之地，则为杨鹤龄祖业，位于歌赋街8号的“杨耀记”商号。（图7-1）此乃革命初起的原生地。⁴

而陈少白稍后于《兴中会革命史要》（1929）一书谓，四人“每遇休暇，辄聚杨室，畅谈革命，慕洪秀全之为人……洪秀全未成而败，清人目之为寇，……因笑自谓我侪四人

其亦清廷之“四大寇”乎”。⁵故“四大寇”乃四人自况洪秀全之称谓。

至于尤列，则于1936年谒祭孙中山之祭文中，谓其时四人“革命倡言，晨夕快悦，意气相期，满腔血热，鼓吹游扬，大义斯揭”。⁶及至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，统一中国后，遂以执政党的政治地位撰写革命史，书写该党由清季孙中山及革命党人缔造及领导国民革命的成就，成为新政权的重要传承。⁷即在此一政治背景影响下，“四大寇”遂成为革命倡导的“主角”。首由邹鲁于其党史名著《中国国民党党史稿》（1929）之兴中会一章，为正统学派著述首先采用孙中山所言，以“四大寇”为孙中山倡导革命运动中的最早同志。自此“四大寇”遂广泛“流传”于辛亥革命研究“正统学派”的革命史著述中。⁸

此后之“四大寇”，即在革命史著述中，自成一格。此即冯自由首起撰写《革命逸史》，而有《兴中会“四大寇”订交始末》的记述，⁹并附孙氏于香港西医书院同班同学关景良所存之“四大寇”照片（图7-2），堪称图文并茂。¹⁰

此后孙中山之传记多见“四大寇”之记述，包括罗香林、高良佐、胡去非、许师慎等四人之撰著。¹¹至此，可见孙中山之倡导革命，已非“孤独的造梦者，或空想者”，¹²尤、陈、杨三人无疑为其最早的志同道合者，而“四大寇”的形象，遂透过照片及文字书写而得以建立。

此后中外学者所出版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，“四大寇”

均见于相关撰著之字里行间。¹³“四大寇”亦由此成为清季革命运动缘起的主要标记，其文字内容与相片由是广传。¹⁴及至2006年香港特区政府为了纪念孙中山逝世140周年，购入港岛卫城道甘棠第此一历史建筑（原建于1915年），进行修建及“活化”工程，以此为孙中山纪念馆，馆内特设“四大寇”塑像，成为展览内容中的重要元素。¹⁵2010年更兴建孙中山纪念公园于港岛西营盘海傍，内设“四大寇”庭院，并立“四大寇”像，借以纪念“四大寇”。¹⁶“四大寇”“革命先行者”形象，亦于焉确立。

孙、尤、陈、杨“四大寇”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，先后移居香港，或升学，或就业。时香港为英国殖民地，推动自由贸易，由是中西文化得以交流。在英人管治下的香港，据孙中山的回忆，城市建设“秩序整齐，建筑闳美，工作进步不断”；且政府官员“洁己奉公”，情形均与国内有着显著的差异。¹⁷孙、尤、陈、杨四人，于此一崭新的殖民地社会及生活空间，目睹香港本地的显著进步，相对于国内的“落后”，其思想遂出现变化。随着清廷对外的不断失败，其中尤以中法越南战争（1884—1885）及中日甲午战争（1894—1895）两役，对于四人影响尤大。¹⁸四人遂逐步踏上革命的路途，最终成为革命的倡导者，进而促成清末民国的政治与社会产生激烈变动，四人由是于辛亥革命史上，获得景仰的地位。以下就四人的生平及参与革命的历程作出论述。

二 “四大寇”的生平事迹

1. 孙中山（1866—1925）

孙中山，名文，幼名帝象，号逸仙，以孙逸仙（Sun



图7-1 孙中山在香港，常与友朋于翠亨同乡杨鹤龄的父亲杨启操（1828—1885，字耀堂）在歌赋街8号开办的“杨耀记”商店聚谈国事。图为1965年“杨耀记”商店旧址遗迹（后该址改为“永德印务”）。



图 7-2 1892 年前后，孙中山在香港与友人合影。前排自左至右：杨鹤龄、孙中山、陈少白、尤列。此四人常相聚抨击时弊，抒发救国抱负，自称为“四大寇”。后立者为同学关心焉。

Yat-sen) 一名闻世。广东省香山县(今中山市)翠亨村人，家世务农，幼读私塾，因其兄孙眉(1854—1915)垦植谋生于夏威夷，于少年时得居此地而具华侨之背景。由是得识中英语文，遂能拓展视野。1883年7月回国，就学香港。入读拔萃书室、中央书院(今皇仁书院)，并于香港接受美部会传教士喜嘉理牧师(Charles R. Hagar, 1850—1917)洗礼入教，¹⁹一度至广州博济医院入学习医，而最终于香港西医书院医科毕业，继而行医澳门、广州，由是来往及居停于省、港、澳三地。从而结识中外师友，如康德黎(James Cantlie, 1857—1926)、何启(1859—1914)、区凤墀(1847—1914)、王煜初(1843—1903)、郑观应(1842—1922)等人，中西学问精进。时值清朝腐败无能，遂思改良中国的专制恶政。1894年，于甲午战争之时，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不果后。至檀香山，始创兴中会，翌年回香港创设兴中会总会，倡导革命，谋求推翻清朝，首义为1895年乙未广

州之役。至1905年前后，联合留学生、华侨，会党，终于创立同盟会于东京，以香港、星加坡、河内为基地，策动粤、桂、滇三省边区革命，前后十次。1911年，终于推翻清朝，结束帝制，创建中华民国。民国肇始，内有袁氏独裁称帝，继有军阀混战，外有列强侵迫，以日本最为野心，交相为祸，国家分裂，国运颓唐。²⁰中山先生起而再革命，于广州三次建立革命政权，建党组军，联俄联共。以武力从事反袁(世凯)护国、护法及北伐；²¹以文字勾勒建国蓝图，揉合中西学术思想，撰写《建国方略》(《孙文学说》、《实业计划》、《民权初步》)、《建国大纲》、《三民主义》。主张对外反帝及民族自决；对内则推行五权宪法(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试、监察)及直接民权(选举权、罢免权、创制权、复决权)；并采用平均地权、节制资本及借用外资的社会、经济政策。目的在于建立独立自主而具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新中国。1924年应冯玉祥、段祺瑞北上，共商国事。针对时局发表

《北上宣言》，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，谋求国家统一。然终因国事忧劳，竟患肝癌，未能及身而见，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北京，赍志以歿。²²然其自由、平等、博爱之遗教与建国之愿景，终为国人所继承而实践之。此即21世纪中国之和平崛起之其来有自。²³而中山先生一生之思想与功业，肇始于香港，结穴于祖国，而最终得为国人所推崇而有“国父”之尊称。²⁴

2. 尤列(1865—1936)

尤列，原籍广东顺德，幼名季搏，字季令，学名其洞，别字少纨，号小园，又名吴兴季子。出身富裕积学之家，曾祖父尤耀东(1765—1846)，早年习丝织机艺；继至省城，学习银钱找换，并受雇于银号，终以经营棉花行及批发而致富，回乡置产，并以“克勤克俭”，“修桥整路”造福乡梓，以此遗训后人。其父光瑶，字云纨，以庶出而继承家业，并以治国学著称。²⁵可见尤列出身具有士商背景的大富积善之家。少时曾受教于同邑名儒陆南朗(蒲泉)，陆氏讲论宋、元、明、清异族入侵史事，激发尤氏的民族思念。早年随家族游历江、浙城镇，以至日、韩两国，得见日本明治维新之新气象。后抵上海，接触洪门，得悉“反清复明”之宗旨，始悟其师陆南朗之教诲，遂“好与洪门会党游，久有兴汉逐满之志”。²⁶1883年北上游京，受业于番禺梁杭雪，继返广州，再受教于孔继蕃、罗照沧二人，由是积学。²⁷

时清廷对外失败，80年代发生中俄伊犁交涉、中法越南战争，屡遭外人侵袭。尤氏目睹时艰，于1885年回粤，遂入学广州算学馆，适值孙中山就读于博济医院，由其早年毕业于博济医院的族兄尤裕堂介绍，而得以认识孙氏。1888年毕业后，任职广州沙田局丈算总目、广东舆图局测绘生。尤氏常往来香港，得悉香港华民政务司招考书记，随即投考而获入选，遂留香港。因至歌赋街“杨耀记”，走访算学馆

同学杨鹤龄，得重遇与杨有同乡之谊的孙中山，相互聚谈，而孙氏同学好友陈少白亦常加入，高言反清，故有“四大寇”之称号，交谊遂深。²⁸尤氏自谓：“此尤列者，实与其至友香山孙君逸仙，密谋民族革命经已数年。”²⁹与此同时，尤氏与辅仁文社社员罗文玉相熟，遂加入辅仁文社，时罗文玉设婚筵于上环寿而康酒楼。该社社员云集，尤氏得与社长杨衢云结识，相谈时务、改革之事至欢，并谓杨氏先祖弃官移民南洋，乃具叛清意识，促使杨氏之民族意识焕发。宴后杨氏又随尤列至“杨耀记”，得见孙中山，孙、杨二人由是建交。1893年冬孙中山毕业后，行医澳门，继至广州，尤氏谓由其出面借广雅书局内南园之抗风轩，邀孙氏及诸友如陆皓东、郑士良等聚会，谋设团体，指称为兴中会创设之始。³⁰至1895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总会于香港，尤列遂与黄咏商、杨衢云等加入该会，投身革命，并将其家乡店铺作为革命据点。继而参与乙未广州之役及庚子惠州之役，并先后于香港、横滨、星加坡三地创设中和堂，联络三地劳工阶层，鼓吹革命。³¹

然而尤列日后对于孙中山的革命领导地位，未见完全诚服。尤氏于1895年乙未广州之役流产后，一度逃至越南。并于1897年重返香港，在香港之西贡创立“中和堂”，自树一帜。翌年于横滨设中和堂分部，出版《国民报》，宣传革命，孙、尤二人遂见分途发展。³²中和堂一称源出中庸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，并以“青天八针白日”为党徽，八针乃指八德，专联工界人士。为兴中会外的革命团体，据说尤列且一度被部份会员推举为兴中会总理。于1900年惠州之役后，又谓尤列在东京手定中华民国国号，刻有“中华民国万岁”圆形象牙国玺一个，并向东京学界，侨界宣布启用。³³继而于1901年庚子惠州之役失败后，南下星加坡，居于华埠牛车水，开设一叶楼中医馆，悬壶行医，以治性病著称，而为当地工界及下层社会所重视。遂于星、马各地组织中和堂分部，悬挂青天白日旗，鼓吹革命。此后革命风潮亦渐入南洋侨社，尤氏遂与当地组织小桃园俱乐部

而具有革命思想的陈楚楠（1884—1971）、张永福（1872—1957）二人结交。陈、张二人继而出资，创办《图南日报》，聘尤列为名誉顾问，此为南洋首见之革命报刊。1905年且参与策动反美工约风潮的抵制活动，海外华人民族情绪，由是牵动。同年孙中山至星加坡推动革命，由于尤列关系，结识陈、张二人，并于晚晴园创立同盟会分会。推陈楚楠为会长，张永福为副会长。星马各地中和堂会员亦相继加入。³⁴

此外，尚须注意者为中和堂成员黄世仲（1872—1912），先后于《图南日报》及香港《中国日报》任职，参与香港同盟会之活动，并撰写大量以革命为题裁的小说，宣扬革命，如《党人碑》一书，以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之反清及批判康有为保皇运动为主要内容。黄氏堪称清季革命文学之旗手，由是驰名香江。³⁵1907年至1908年，孙中山于粤、桂、滇三省策动之边区革命，相继失败。其中云南河口一役，败逃之革命党人，退入越南，继而遣返至星加坡，皆由尤列出面安排善后，并且一度因党人犯事而被牵连入狱。³⁶

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后，尤氏率中和堂成员回国，一方面运动广东光复；另一方面则亲至云南，受寓日时相识的蔡锷（1882—1916）招待，参与云南光复之举。随即受袁世凯所邀北上，聘为总统府高等顾问。时袁氏之目的，乃计划利用尤列削弱孙中山之势力，结果因袁称帝，政见不合，尤列逃离北京，³⁷由天津而至日本，居留于神户达6年之久（1914—1920），以教书、行医为生，并撰书自娱，是为《四书章节便览》一书。1921年始返港定居，结束其奔走革命之生涯。³⁸

居港期间，目睹时艰，内有军阀混战，国共斗争，外则日本侵华。遂起而阐扬孔子遗教，谋求以伦理救国。于九龙旺角广华街2号，创设“皇觉书院”，出任院长，每逢周日正午公开讲学，阐扬孔教，由其门人笔记讲章，编成《孔教革命》一书。继而发起筹建孔圣堂于港岛加路连山道，藉以立会兴教，作为孔教团体集会、办学之地，用是宏扬圣道，振兴儒术。此外，尤列精于黄歧之术，早年

于星加坡牛车水，以行医吸纳同志。今则于香港东华医院出任医师，至1931年参与创立中华国医学会，出任干事长，倡导中医。由此可见，尤列青年时为“四大寇”，倡导革命，谋求政治救国。至其晚年则起而宏扬孔教，鼓吹中医，以传统文化济世。尤列遂得于南天海角之香港一隅，获得名声。1931年尤氏81岁高寿之时，香港革命同志，如宋居仁、李纪堂、谢英佰等46人，遂发起为其祝寿，设宴于油麻地吴淞街大观酒楼，出席者700余人，盛极一时。至1936年，外侮日亟，应中央之邀，北上南京，共商国是，并于中央广播电台，发表《国难当中国民应有认识》，力主国家团结，维护中华民国河山。继而至中山陵，拜祭“老友”孙中山，朗诵祭文，忆昔“四大寇”倡导革命，“意气相期，满腔血热”。奔走革命，以至人天相隔，“抱玉悲号，知音弦绝”，而今国难当前，不禁声泪俱下。此后尤氏身体日见违和，终于193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之日病逝。翌年卜葬于南京麒麟门外小白龙山，享年72岁。³⁹

3. 陈少白（1869—1934）

陈少白，广东新会人，幼名闻韶，号夔石，少白一名，乃慕乡贤大儒白沙先生而得。先世自闽迁粤，属官宦之家。据陆丹林所说，誉其“身長玉立，丰姿俊美，稟性聪颖，才思敏捷，诗文歌赋，琴棋诗画，无不精通”。⁴⁰就其家族与成长而言，其父子桥以“倡导新学新政，好议论国际事”而著称，乡人称之为“进教佬子桥”。皆因父子二人，先后归信基督教。⁴¹少白早年居乡习举业，初受教于四叔梦南（1840—1882），及梦南逝世，先后受教于族兄心夔，翰周二人，从同邑陈源泉学习经传、时文、书法。⁴²梦南为两广教会名人，早年以诗书积学闻名乡里，因参加童子试，得聆福音，由是归信，加入浸信会。得识该会著名传教士纪好弼（Roswell H. Graves, 1833—1913），于其所创办的义学书馆任教，并助其译书，着有《与女史论道》一

书。其后创立华人宣道堂，自任传道，倡导华人教会自立，务求除去洋教外衣，故被视为近代中国信徒鼓吹中国教会自立的第一人。⁴³

时梦南自广州携西学译本回乡，少白得而读之“始知世界大势，发生国家观念”，并谓“革命思想多得于季父，自是弃帖括，习有用之学”。⁴⁴由此可见，西教士借出版西书以宣教的间接方法，无疑为促使华人信徒产生革新思想的重要触媒，陈少白即为明显的个案。⁴⁵1888年美国长老会哈巴牧师（Andrew P. Happer, 1818—1894）在华筹设教会大学，初拟建校上海，其父子桥与地方士绅联函，建议哈巴于广州办学，结果创设格致书院（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），是为岭南大学之前身，少白即为第一位入学者，遂受洗入教。同年因事至香港，由区凤墀亲函推介，得识就读香港西医书院的孙中山，二人一见如故。少白随即辍学，南下香港谋生；并因孙中山的引介，蒙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康德黎接纳入学。遂成同窗。⁴⁶

此后，少白不但成为孙中山的挚友，且结义金兰，时目睹清廷腐败无能，列强侵袭，陈氏深感“君相委靡而少仁，官府贪殊而无耻……又复开门揖盗”，产生“国以民为本”之民主思想，从而成为孙中山倡导革命的重要伙伴。1894年孙中山撰《上李鸿章书》，文中尤重农业改良，陈少白参与润色此文，亦同具救济农民及农业改良思想。⁴⁷至1895年加入兴中会，参与策动乙未广州之役，失败后流亡日本，在横滨，协助兴中会分会会长冯镜如编印《英华字典》，借此谋生。并联络日本同情中国革命的志士，透过孙中山檀香山友人菅原传的介绍，结识曾根俊虎、宫崎寅藏等人。⁴⁸1897年孙中山于伦敦蒙难，死里逃生后，东返日本，因陈少白而结识愿意支持中国革命的犬养毅、宫崎寅藏等人。1897年东渡台湾，与当地日人名流如日下峰莲、馆森鸿等人交往，后者更誉陈氏为“今世之奇才”，陈少白透过杨心如关系，认识侨商容祺年、吴文秀、赵满潮等人，

创设兴中会分会于台北。⁴⁹1899年至香港，翌年创办《中国日报》于中环史丹利街24号，鼓吹革命，为清季革命报刊之元祖。期间由于陈氏擅长文字，不少革命宣传文字，皆出其手笔。日后保皇党创设《商报》于香港，主张保皇扶满。少白则力主排满革命，痛加驳斥，双方发生笔战。⁵⁰于1900年并在港联系兴中会，三合会及两湖的哥老会，合组兴汉会，推举孙中山为该会会长，密谋革命。1900年惠州之役即由此而起。1905年，更被推为香港同盟会分会会长，参与粤、桂、滇边省起义。又创设剧团，分别为广州华南歌剧团、优天影、振天声等。公演粤剧，如《熊飞起义》，乃宋遗民东莞熊飞起兵抗元之榴花桥故事，借以鼓吹革命。及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，出任广东革命政府的外交司，随即退出政界，成立粤航公司，从法商购得哈德安及播宝二轮，专注粤、港航运业经营，结束其席不暇暖的革命生涯。⁵¹继而献身家乡外海乡的社会建设，包括开辟马路、禁绝烟赌、建筑市场，及推动捐建乡校，开办念梦学舍等，后者为纪念其父子桥及叔父梦南而设。⁵²期间除于1921年，一度出任孙中山广州总统府顾问外，未再出任其他公职。及至孙中山去世后，于1929年移灵奉安南京，陈氏入京参加，亲撰挽联，联曰：“失败云乎哉？行道期百年，唾弃小就，力赴大同，虽在颠沛中、弥留中，未尝少懈。流风今已矣，人世垂卅载，驱策群雄，招徕多士，为问真知己、真同调，究属阿谁！”⁵³陈氏之知孙，溢于“联”表。晚年更以念诗写字，作为排遣，至1934年去世。陈氏与史坚如之妹憬然订有婚盟，憬然亦热心革命，惜染病早逝，未成好事。⁵⁴

4. 杨鹤龄（1868—1934）

杨鹤龄（图7-3），字礼遐，为孙中山之同乡。父显光曾任知府，晚年辞官归故里，从商于港澳，并于香港歌赋街开设“杨耀记”商店。杨鹤龄“为人亢爽不羈，喜谐谑”，⁵⁵与孙中山、陆皓东二人，自幼相识，童年时得听



图 7-3 杨鹤龄

太平天国革命故事，向往洪杨革命。早年受教于岭南硕学简竹居（1851—1933），其后亦至广州算学馆就读，与尤列为同窗。⁵⁶ 1886年孙中山至广州博济医院习医，得识尤列，翌年至香港西医书院就读，结交陈少白而成同窗，而尤列、杨鹤龄亦相继寓港，四人遂能时相聚会于杨耀记，高谈阔论，

仰慕洪秀全，并提出“勿敬朝廷”，是为“四大寇”时期。⁵⁷ 此外尚须一提，“四大寇”照片中的关景良，其弟关景星（1877—1955），亦肄业于香港西医书院，娶妻杨舜华（1884—1951），乃杨鹤龄之妹，可见关杨二家，关系密切。关家为基督教世家，日后杨鹤龄亦见归信基督教。⁵⁸

及至孙中山毕业后，先后到澳门及广州行医，开设药局，除获粤、澳富商支持外，并得杨氏出手相助。澳门草堆街所开办的中西药局，乃透过杨氏推介，获其七妹夫吴节薇担保，向当地镜湖医院借得本银 2000 元，用作赠药施诊。由于医术高明，孙氏誉满濠江。然因遭当地医师排挤及镜湖医院的司事、中医所忌，⁵⁹ 只得转赴广州开设东西药局，杨氏毅然将其澳门龙嵩街大楼转让吴节薇，资助孙氏开业。⁶⁰ 当孙中山行医于澳门之际，其往来“同志”，唯独同乡“陆皓东、杨鹤龄、杨心如等数人，往来石岐、香港、澳门，相与畅谈时政”。⁶¹ 至 1895 年成立兴中会总会于香港，鹤龄及其侄心如二人即加入成为会员，支持革命。⁶²

乙未广州之役，由于杨鹤龄之关系，其侄心如及岳父程耀臣参与是役。及至失败，程耀臣被捕死于狱中，而杨心如则随孙中山、郑士良逃至澳门，而再至台北。任职吴文秀父亲所开之良德洋行（办茶）的司帐。其后陈少白至台北访之，透过杨心如，遂得吸纳侨商吴文秀、容祺年、

赵满潮等人，组织台湾兴中会分会。⁶³ 随着孙中山于粤、桂、滇三省策动边区革命，杨氏又将其所获父亲的遗产变卖，提供武装起义，购买军火所需。⁶⁴ 与此同时，杨氏一度参与《中国日报》的“革命宣传”工作，然据该报记者陈春生所说，杨氏能文，但“每因懒于执笔，时使春生代庖”。⁶⁵ 及至蛰居于以“烟赌为业”的澳门（水坑尾巷 14 号），⁶⁶ 竟然染上芙蓉之癖，且患哮喘病，又老年丧偶，生活日见困难。杨氏曾致函孙中山，自述“平素不善治生，上下无交，竟成废弃，深为自惜”，遂向孙氏求助。陈春生谓孙氏赠与金钱，助其续娶卢氏女。⁶⁷

辛亥革命成功后，杨氏前赴南京，出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，然为时甚短。此后由于生活困苦，于 1919 年及 1920 年再向孙中山求助。至 1921 年孙氏于广州第二次建立政权，出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时，敦聘杨氏为总统府顾问，月送公费 200 元；1923 年，于平定陈炯明叛乱，于广州设大本营，第三次建立政权，委派杨氏为港澳特务调查员，皆属闲散之职。⁶⁸ 及至孙中山去世，杨氏蒿目时艰，毅然戒掉鸦片烟瘾。晚年每每为兴中会时期，曾对革命出力及牺牲之同志，如黄咏商、程耀臣、朱贵全、邱泗、郑士良、杨衢云等上书，要求国府抚恤其遗族。又为孙中山之家族，如孙母杨氏；长兄孙眉、孙昌父子及其妻舅谭弼；妹夫林嘉智、林镜父子，要求表扬及抚恤。借以彰显革命先烈开国之功。期间国事日非，日敌入侵，杨氏心怀悲痛，于 1934 年，郁郁以终，归葬于故乡翠亨村金槟榔山。时人唐绍仪曾为杨氏作挽诗，藉以悼念，谓“……革命称四杰，足当万夫雄，公尤丰于家，夙高任侠风，慨以满籛金，来助军储供”，也许可作为杨鹤龄生平之最佳写照。⁶⁹

三 结论

清季革命起源于香港，此乃孙中山在港接受教育，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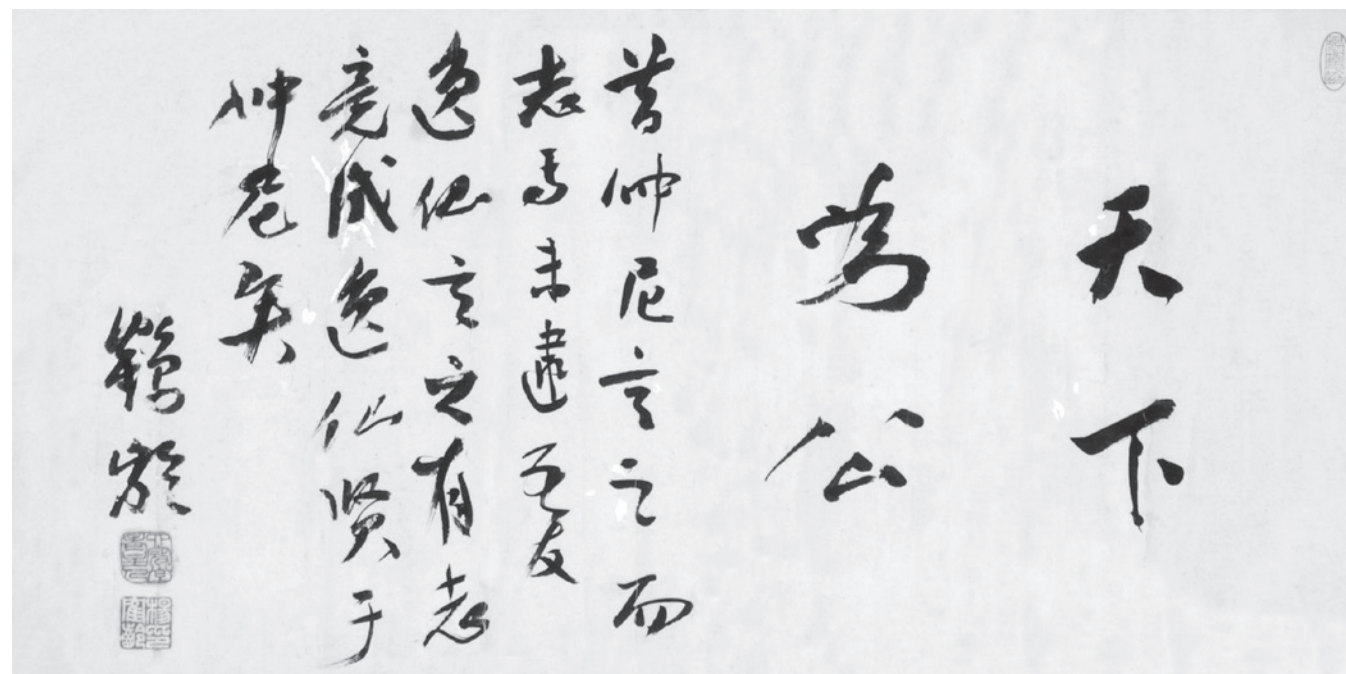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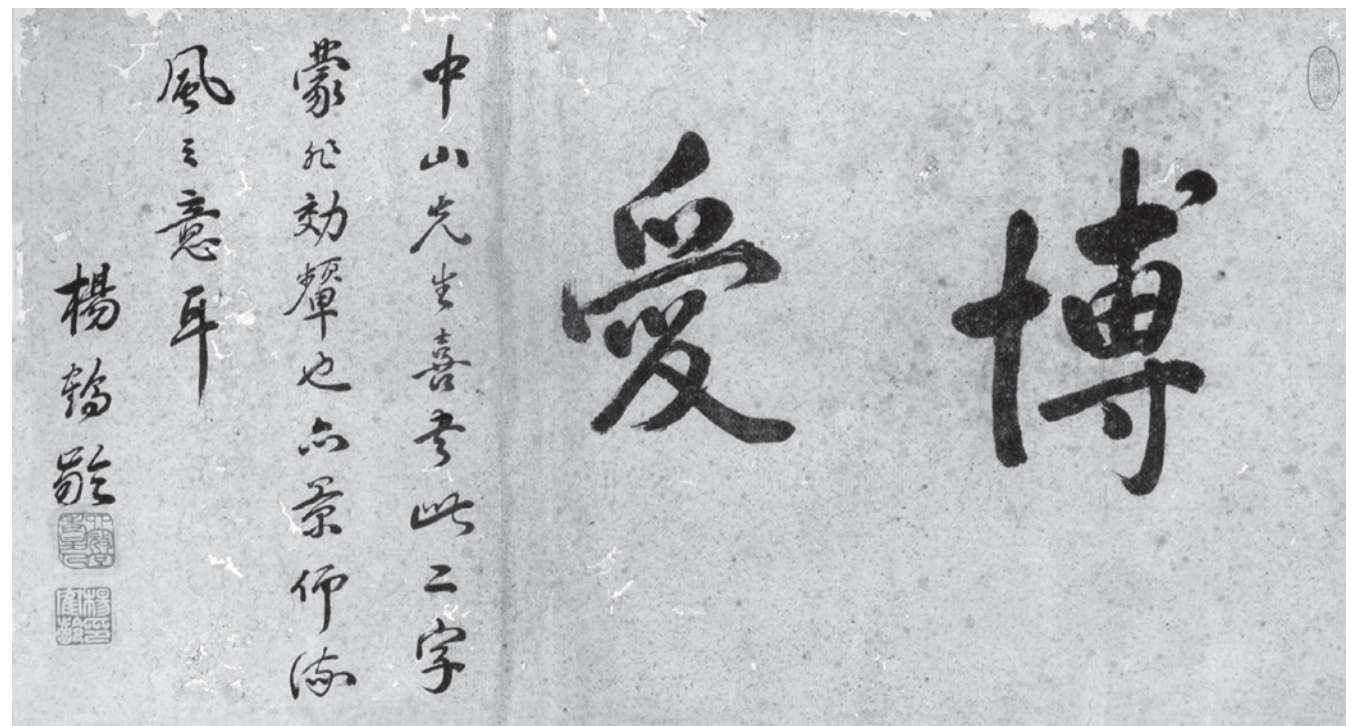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7-4 杨鹤龄“博爱”、“天下为公”题词手迹

生革命思想；同时，结识师友，日后多成为其早期的革命同志。继而于1895年成立兴中会总会于香港，同年策动首次起义——乙未广州之役，有以致之。其中兴中会早期重要成员除孙氏外，尚有尤列、陈少白、杨鹤龄三人。四人早于1888年至1892年间，时常聚谈于歌赋街8号“杨耀记”，言行反清，因而被称为“四大寇”，此后相继投身革命。“四大寇”于孙中山传记及革命史著述中，遂见篇幅。然四人生平及投身革命至死之历程，除孙中山外，少为学者所关注，本文即由此入手论述。

就孙中山革命生涯观之，自甲午战争后，起而首创兴中会、同盟会，密谋革命，先后领导十次武装起义，⁷⁰及至辛亥革命成功，一度出任临时大总统。而尤列则于1895年自行创设中和堂于香港、横滨、星加坡，分途发展。然其所说中和堂之与兴中会、同盟会，乃属二而为一，实乃与孙中山共同革命而已。其中同盟会成立后，孙中山即透过尤列之中和堂，得以开拓及组建星、马地区的革命力量。至于陈少白，则为孙中山之义结金兰，最为得力之助手，故孙氏以吾弟称之。协助孙中山策动起义，联络日本志士，建立台湾兴中会分会，出任香港同盟会分会会长，创办《中国日报》，首起以言论宣扬革命。参加乙未广州、庚子惠

州诸役，直至辛亥革命广州光复，出任军政府外交部长。⁷¹由此可见，四人于青年时期成为同倡反清革命之“先行者”。投身革命后，各有经历。及至晚年孙氏由于反袁、反军阀，先后在广州建立三次政权，谋求以武力统一中国，其间并提出《建国方略》、《建国大纲》、《三民主义》，作为建国蓝图，影响自然深远。尤列则晚年寓居香江，以宏扬孔教，鼓吹中医，转而以传统文化济世自处。至于陈少白，竟然功成身退，转而营商，建设家乡，终其晚年。杨鹤龄则加入兴中会，奉献金钱，任职《中国日报》，以此支持革命。然杨鹤龄晚年潦倒，求助于孙中山，并为早期革命同志及孙氏家人，争取抚恤及表扬。至此，四人中尤氏变身文化人，陈氏为地方商人，而杨氏则为一介平民，唯独孙中山辗转而成为国家领导。“四大寇”之革命人生堪称同途而殊归。1921年孙中山开府广州，缅怀“四大寇”昔日友情，遂于观音山总统府侧之文澜阁，修建居室，名为“三老楼”，招聚尤、陈、杨三人，借以聚旧，并作顾问。⁷²然综观四人青年时起而以革命救国，可惜直至临终之时，由四人所“催生”的共和国，却依然内忧外患频生，未见富强之光景。也许只能如孙氏遗言所说“革命尚未成功”，四人只能赍志以歿，是为“四大寇”一生之最后注脚。